
精准扶贫背景下

驻村工作队文化扶贫作用与机制构建

——以湖北通城县H村Z大学驻村工作队为例

金慧¹ 余启军²¹

(1. 武汉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 文化扶贫有助于贫困人口能力和观念上脱贫, 在精准扶贫中有效发挥内源驱动、活力重构、组织保障、精准施策的特殊作用, 提升贫困地区发展的可持续性。驻村工作队进驻贫困村开展精准扶贫是当下我国精准扶贫攻坚的重要工作机制之一。作为外部嵌入性力量, 驻村工作队对于乡村治理结构优化, 弥补村干部在文化扶贫中的能力短板, 提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价值观的引领功能, 确保扶贫实践的精准和高效, 发挥其在文化扶贫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具有现实必要性与制度合理性。湖北通城县H村Z大学驻村工作队的实践表明, 驻村工作队通过选优配强驻村干部, 嵌入贫困村基层组织内部精准识别文化资源, 制定文化扶贫规划, 统筹发展文化基础设施和基础教育, 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及科技文化活动, 大力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 提高村民自治和自我管理能力等多种方式构建文化扶贫工作机制, 并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成效, 为我国乡村精准扶贫提供了有效路径和切入点。

【关键词】: 文化扶贫 驻村工作队 能力脱贫 村庄治理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77 (2019) 08-0052-08

2013年习近平同志在湖南湘西考察时, 明确提出“精准扶贫”新方略。具体来说, 就是“六个精准”, 即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位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因村派人精准是指以驻村工作队为精准扶贫的“滴灌管道”, 实现对贫困户的精准帮扶、精准滴灌。^{[1](p74)}因村选派驻村文化扶贫工作队是整个精准扶贫工作中的重要机制和组织性力量, 它的核心作用之一是发挥自身资源和能力优势, 通过文化扶贫, 以“人”为基础, 从文化观念、科技知识、文化资源发掘及开发等方面达成人的素质脱贫目标,^{[2](p31)}实现精准施策, 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地区脱贫问题。但是, 我国在文化扶贫实践中, 其实施主体、组织力量等方面均面临着诸多现实困难。因而, 深入探析驻村工作队文化扶贫工作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文化扶贫在精准扶贫中的特殊作用

作者简介: 金慧 (1969—), 女, 武汉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余启军 (1966—), 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2016年湖北省重大调研课题基金项目“湖北省新型文化扶贫模式研究” (LX201624)

（一）内源驱动：致力观念及能力“扶人”，实现自我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文化扶贫就是通过改善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培训、文化环境等方面，改变贫困地区人的落后的观念，激发当地群众脱贫愿望和信心，提升贫困主体的发展能力。一般来说，贫困地区的人思想比较僵化，缺乏发展和长远的眼光，轻视教育；缺乏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不敢接受新兴事物，缺乏创新精神；靠天吃饭，等、靠、要思想严重，缺乏积极进取精神等等。这种思想观念也极大地限制了贫困主体的自我发展的能力，鲜有提升自身文化技术水平的学习和培训机会；无法利用网络等现代技术手段掌握市场信息；缺乏必要的交往能力和重大事项的判断决策能力。

精准扶贫工作通常是围绕着作为扶贫对象的“贫困主体”展开。如果只注重政策扶贫、资金扶贫，只注重“从外向内的输血”，贫困主体的生活条件虽然能在一段时间内得到改善，但是返贫的可能性极大。因此，精准扶贫工作在“造血”，外援式扶贫的同时，也要发展贫困人口摆脱扶贫的“内生性”力量。而通过文化扶贫使得贫困主体获得自我发展，探索摆脱贫困的途径是最重要的一环。

通过文化扶贫，改变贫困地区人们的传统观念和落后文化，将独立、自主，不断进取和学习的现代观念融入他们的思想，通过发展公共文化、技术教育，发展文化产业，使得贫困主体获得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从根本上改善其生活水平，从而有效地帮助他们脱贫。

（二）活力重构：促进贫困地区劳动力就地转移，使乡村社会去“空心化”。

通过文化扶贫，一方面，大力促进贫困地区对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资源有效利用，“活化”当地独特的文化资源，开发文化产业，发展文化旅游，推广和销售文化产品等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如利用独特的民俗、建筑文化和传统工艺、民族节日、民族饰品等带有鲜明地方特色文化符号的文化要素，开发特色文化旅游产品，发展特色文化旅游，带动就业，增加当地村民的收入。另一方面，通过文化扶贫，提高当地居民的素质、专业技能和文化水平，培养了现代企业和现代农业所需的劳动力资源。如基础文化知识培训、技术培训、专业技能培训等。一旦有企业家要在贫困地区投资办厂，便可以在当地以较低成本招募到合格的、就地转化的“技术工人”。与此同时，现代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能够改变贫困地区的整体环境，吸引外地打工的青壮年劳动力回乡就业，从而改变当前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的“空心化”现象，还可以很好地解决留守儿童等家庭和伦理问题，重构活力型的乡村社会。

（三）组织保障：加强乡村政治、思想和文化建设，确保国家扶贫政策落实。

精准扶贫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对贫困地区的政策、资源、经济反哺与援助，重塑中央和政府边缘和贫困地区的权威和政治认同，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维持这些地区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使得贫困地区共享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感受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幸福与温暖，文化扶贫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契机和重要手段。

文化扶贫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贫困地区宣讲党和国家关于精准扶贫、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的最新政策制度；宣讲改革开放和国家建设的最新成就；弘扬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的社会主义文化，从而使得贫困地区居民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治国理政方略的认识、理解和认同。

同时，以文化扶贫为契机，通过加强贫困地区基层组织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先进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改变贫困地区基层党的建设和作用发挥不力现状。加强贫困地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和文化建设，为发挥党组织在密切联系群众，维护乡村稳定，也是为推进精准扶贫工作提供有力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四）“靶向”施策：精准识别文化及资源禀赋，使扶贫工作更具针对性。

文化扶贫在促进精准扶贫过程中的“精准性”方面，作用发挥具有“先决性”特点。它有利于更加精准的识别与帮扶。文化是依附于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文化概念。我们说到的扶贫文化是历史的，相对的，它是依赖于特定的地理环境、特定的民族、特定的风俗习惯。文化扶贫并不是简单地将某种能带来经济利益和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强行移植和推行到贫困地区，而是在理解、尊重贫困地区既存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对之有所继承，有所革新，使得该地区的居民形成和发展某种更为健康、更有活力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正是贫困地区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气候、资源、历史、教育、习俗等具体特征，形塑了该地域的特殊文化。

因此，文化扶贫的重要基础环节，是在精准识别贫困地区地域文化特征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精准施策，或是发展特色农业，或是开发文化遗产资源，发展旅游业，抑或是招商引资，开办工厂。精准识别贫困地区的文化特征，掌握和了解该地域居民的观念、心理和思维习惯，有助于扶贫工作人员适时调整工作方式，提高沟通的效率，使得扶贫对象接受和了解党和政府的精准扶贫政策，并在行动上支持配合，从而提升扶贫工作的整体效果。

二、驻村工作队在乡村治理及文化扶贫中的作用发挥和现实需要

驻村工作队进驻贫困村指导帮助、配合村“两委”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要工作机制之一。该机制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建立驻村工作队制度，确保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工作队，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实现村村帮扶长期化、制度化。驻村工作队介入村庄治理的权力来源于中央和地方党委及组织人事部门。^{[3] (p67)} 驻村工作队在乡村治理和扶贫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其在文化扶贫中主导作用不可低估。

（一）作为外部“嵌入型”力量，有助于乡村治理结构的优化。

驻村工作队特有的组织优势和“嵌入性”力量特点，有助于打破传统乡村治理功能分割和制度僵化的困局，推动乡村治理结构的优化，为乡村文化扶贫工作的开展打下重要的组织基础和施政基础。

首先，驻村工作队一定程度上作为国家权威的象征和代理人，以外部植入的方式直接介入了基层社会，辅助原有的基层行政组织行使各种行政职能，实现了国家的政治意志。^{[4] (p31)} “驻村干部使得原来依附于科层体系的乡村治理结构发生了变化，呈现出政治动员、跨部门互动和人格化交往等“非科层化”运作的特征，并由此使政府动员机制从‘单线动员’转向“多线动员”，资源配置从‘弥散’到‘精准’，政府组织形式由‘僵化’到‘弹性’”。^{[4] (p31)}

第二，驻村工作队作为外部“第三方”，对村庄治理的参与实际上构成了对村干部决策和权力运用的一种监督和约束。村干部土生土长，很容易受到人情、关系等传统伦理的影响，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扶贫资源分配方面容易受情感因素羁绊，执行党和国家的有关规定，容易有所偏私，妨碍公正。驻村工作队作为独立于村干部的一种力量，一方面可以帮助村干部树立行政权威，另一方面又因身份特殊和超然，能够对精准扶贫过程中村干部的贪污腐败、不合理、不公正的行为进行监督。他们也可以接受村民的投诉举报，直接找村民调查核实情况，及时对违法违纪情况进行处理。驻村工作队从外部对村干部的监督，有利于村庄切实执行上级党组织和政府有关文化扶贫的政策、制度，有利于文化扶贫开展过程中的公平、有序。

（二）具有特定能力优势，有效弥补村干部在文化扶贫中的能力短板。

首先，驻村工作队员具备良好的内在优势。他们较高的能力素质，便于充分理解国家扶贫政策并精准贯彻落实。村干部是通过民主选举从村民中产生出来的，但他们整体的知识文化水平较低，再加上传统乡村社会存在的封闭性，使得他们无法清晰而准确地认识到党和国家的最新方针政策，^{[5] (p10)} 不能很好地把握精准扶贫政策的精神和具体要求。而驻村工作队基本上来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优秀党员干部，大多受过高等教育，知识水平和能力都比较突出，驻村后他们能充分利用这些内在优势，补充村干部在这些方面能力的不足，一方面使得村干部对国家的精准扶贫制度和党的政策方针获得正确、深入的认识。还可协

助村干部在理论、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制度方面对村民开展宣传教育，减少村干部在执行国家精准扶贫制度方面的压力和阻力，化解村干部和村民的矛盾，维护村集体的团结和凝聚力。另一方面，帮助村干部准确识别和判断不同的文化类型及其对经济发展和特定区域群体的社会生活带来的潜在影响，以便贯彻落实各级扶贫政策的“六个精准”。

其次，驻村工作队还拥有派出单位和广泛的社会资源等外在优势。由于历史发展和社会环境等原因，目前贫困乡村因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公共基础设施欠缺；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社会精英流失，“空心化”严重；当地居民不重视教育，留守儿童现象严重，初高中辍学率高。加上趋利性思维败坏了乡土社会淳朴、勤劳的社会风气，赌博、玩乐逐渐代替了劳作。客观的现实是，乡村社会已经陷入了一个自我发展的困局，很难通过自身的力量得到有效改善。那么，驻村工作队可以利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契机，依托其个人能力和派出单位党政领导和部门的支持，既能引入资金进行图书馆、学校等文化公共设施建设，又能运用自己的理论优势进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宣传教育，发展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提升农民科技文化修养，还能有效沟通多方社会资源，整合扶贫攻坚“破局”的现实力量，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振兴农村经济，吸引农民工返乡就业，通过提高村民的效益和获得感来调动村民的脱贫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乡村重构活力并获得整体上的良性发展。

（三）作为文化扶贫的适当主体，更能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价值观的引领功能。

文化扶贫的实施主体和承担者应该满足以下要求：一是对于贫困地区既有的文化基础和特征有充分的了解；二是对于待传播和发扬的现代科技文化内涵要有准确的理解和熟谙；三是有能力从组织实施和资源配置上持续进行文化扶贫。

文化扶贫主体理当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现代文明成果和观念的模范学习者和实践者，自然也是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先进文化的传播者。他们应当拥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有能力准确识别和判断不同的文化类型及其对经济发展和特定区域群体的社会生活带来的潜在影响。驻村工作队员一般是由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派出的优秀党员干部，基本上都受过高等教育，理论素养和政治素质过硬，并且熟悉党的理论方针政策，代表着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普遍符合这一基本素质要求，胜任文化扶贫中文化、文明的使者和传播者角色。

传统的文化扶贫主体之一的图书馆单位和社会公益组织，在文化资源的输入和传播、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能履行部分文化扶贫职能，由于缺乏在贫困村一定时间的生活经历，以及没有对其原有的文化习俗深入了解，又缺乏持续稳定的组织性力量予以支撑，因而不能是完全主体；而当地村干部虽然熟悉乡土社会的情况，但是他们缺乏对党的理论和先进文化的理解和掌握，推行文化扶贫的组织性力量和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也欠缺，他们都难以承担只有持续投入时间和精力才能实现的文化扶贫重任，也不是最适当主体；反观驻村工作队，则具备独特的比较优势：一方面，驻村工作队熟悉党的理论方针政策，他们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现代文明成果和观念的模范学习者和实践者；另一方面，驻村工作队具有文化扶贫的组织资源优势，有派出单位党政领导和部门的支持，不仅能够引入资金进行图书馆、学校等文化公共设施建设，还能有能力开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宣传教育。因而，驻村工作队很好地满足了上述实施主体的条件，是承担文化扶贫工作的适当主体，可充分发挥其在文化扶贫工作中的价值观引领作用。

（四）因地制宜，确保文化扶贫实践的精准和高效。

一种新的文化的确立，要求群体的成员对其普遍认同，从而改变自己原有的思维、观念，交往习惯和生活方式。但这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它需要对个体耳濡目染的观念和习惯等既有的文化的调试和修正。新文化要素发挥作用的过程是对原有文化不适应现代文明的糟粕和否定性因素的剔除，对于原有文化的生命力和有价值部分在新的条件下的继承和发扬。

文化扶贫必须以目标群体原有文化的识别和深入了解为基础。这要求文化扶贫的主体要有比较长的时间与目标群体共同生活，深入了解该地域、该群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驻村工作队至少有一年的时间在贫困村生活和工作，他们通过接触该地域、该群体的日常，进而深入了解这些贫困地区待传播和可挖掘的文化资源和特殊文化天赋异禀，在认真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之上，

对其目标群体原有文化属性精准识别，从而，为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奠定基础，确保文化扶贫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比如，在文化扶贫实践中，驻村工作队可以深入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利用特色优势，找到突破口和发力点，科学规划，精准施策，高效整合多方资源，统筹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脱贫意识和“造血”能力，通过发展旅游业、现代产业等，提高村民的效益和获得感，调动村民的勤奋劳动的积极性，从而助力振兴农村经济，吸引农民工返乡就业，使得乡村具有活力并获得整体上的良性发展。

三、湖北通城县H村Z 大学驻村工作队的案例分析

湖北省通城县H 村是幕阜山脉黄龙山上的一个有200多户村民的小村子，交通不便，几无经济支柱产业，农民经济收入难以提高，脱贫难度相当大。按照湖北省扶贫攻坚领导小组的统一安排，Z大学是H 村的帮扶单位。为此，该大学从2015 年12月起至2018年3月先后共派出三批扶贫驻村工作队，指导和协助该村的精准扶贫工作。驻村工作队以文化扶贫为基本策略，坚持“输血”与“造血”相结合，使得该村具有了可持续发展的扶贫产业和稳定的村集体收入，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坚持标准，严把驻村工作队队员综合素质关。

选拔精力充沛、责任心强，工作能力突出，思想政治素质过硬的干部，组成驻村工作队是开展好文化扶贫工作的基础和前提。Z大学在选拔驻村工作队成员时特别强调以下条件：一是要政治立场坚定，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各项政策，思想政治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要有服务“三农”的工作热情，具有良好的政策理论水平和组织管理能力。三是组织纪律意识强，服从组织安排，具有奉献精神和服务意识，工作踏实，廉洁自律。三年来，Z大学经过层层选拔和考核，先后选出三批共8个干部组成驻村工作队赴H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其人员构成如表1所示。

表1 Z大学驻村工作队成员个人情况一览表

驻村工 作队人数	年龄结构				学历结构				干部级别				所属工作部门			
	30-40		40-50		本科		硕士		科级		副处级		思想政治系列		党政管理干部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8	5	62.5%	3	37.5%	1	12.5%	7	87.5%	6	75%	2	25%	3	37.5%	5	62.5%

数据来源：根据《湖北省驻农村工作队（扶贫工作队）工作简报》（2015—2018）整理所得。

从驻村工作队成员的年龄构成来看，大多数干部在30—40岁之间，正处于年富力强、事业的上升期，身体素质和精力能够适应较长时间的帮扶山村艰苦生活和繁重工作。此外，驻H村工作队还适时补充了3位40—50岁的干部，他们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能够应对和驾驭扶贫过程中的复杂局面，在关键时刻能够对年轻队员在工作方法和策略上及时有效的指导。学校根据干部的实际情况，没有选派50岁以上，或即将退休的干部，也没有选派身体健康状况欠佳，或驻村扶贫动力和热情不足的人员。

从驻村工作队成员的学历结构来看，绝大多数都具有硕士学历。较高的知识和理论水平，确保了驻村工作队能够准确理解和执行党和政府“三农”政策和扶贫攻坚方略，有准确宣传、执行上级政策要求的热情和能力；能够对精准扶贫过程中所反映出的问题和现象进行科学的数据分析，特别是对摸底出来的大量数据、资料进行科学的分类、统计、整理、运用，为扶贫中科学研究和精准施策提供参考；有能力对帮扶对象的文化发展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制定行之有效的文化扶贫整体发展战略。

从驻村工作队成员的行政级别来看，大多数属于科级。Z大学制定和出台激励性的制度规定，明确驻村干部完成扶贫任务后

的职务晋升时，同等条件下可优先选拔任用，这使得在当前干部选任中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参加驻村工作队的经历成为一个竞争优势；但如果不按照要求认真完成扶贫工作，那么可能被召回，留下不好的记录，影响日后的职业发展。这客观上成为驻村扶贫工作得以顺利和有效开展的一个激励和制约条件，有力地鞭策着村干部认真履行扶贫“使者”的责任和作为。

从原所属工作部门来看，驻村工作队成员多为高校的党政管理部门的党员干部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他们都有丰富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经验。因为村干部需要各级政府和组织沟通，要和村两委干部、村民、贫困户打交道，既要负责政策文件的上传下达，又要负责扶贫政策和措施的有效组织和精准落实，全面的工作能力和经验尤其必要。学校在选拔驻村工作队的人员时，充分考虑到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 and 行政管理能力、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的德才兼备干部，为文化扶贫工作的成功展开奠定了良好的人力条件。

（二）嵌入贫困村内部，精准识别，科学制定文化扶贫发展规划。

驻村工作队不能只是村干部的配合者，而应该是作为扶贫的主导者。^{[31] (p72)} 扶贫项目资源和资金的分配等不能完全依赖村干部提供的信息，以村干部为媒介，做“悬浮式扶贫”，而应该是“嵌入式”的全程参与。驻村工作队要主动同贫困户接触，深入到贫困村的内部，了解贫困村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气候、自然资源、村民受教育水平、经济发展、学校设施、生活观念和习俗等形成该地域乡村文化特征的要素，做好对该地域文化因素和特征的“精准识别”，有针对性地对该村的文化现状做出客观的评估，从而为进一步的文化扶贫进行科学的规划。

Z大学H村工作队驻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双脚去丈量该村的山山水水，亲自登门和每个贫困户进行深入交谈，了解村情民俗；实地查阅村里的文化建设、文化扶贫资料和档案，在精准识别该村文化发展特征的基础上，会同学校有关专家教授，共同研究和科学制定了H村的文化扶贫发展规划，内容涉及该村黄龙山的文化旅游项目、贫困学生教育资助和结对帮扶，乡村图书馆、卫生设施建设，有线、互联网覆盖和村容村貌美化等诸多方面。

（三）硬软结合，统筹发展文化设施和教育两个“基础”。

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是文化扶贫的重中之重。文化站、图书馆、信息网络等文化基础设施是为村民提供学习知识、接受信息、拓展视野和认识世界的物质条件和有效载体。而贫困村落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村民吸取知识和自我教育的设施欠缺，严重影响了村民素质的提高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对此，H村驻村工作队充分利用校友和校地关系优势，积极争取，使得H村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空前改观。驻村工作队向咸宁市城建委争取首批投资10万元，为H村主干道路安装了30盏太阳能路灯；利用Z大学捐赠的价值5万多元的图书期刊、文体用品、办公桌椅、投影仪等建立镇小学图书馆，并建立了两个农村书屋；争取价值2万元的17台电视机赠送贫困家庭，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

教育是提升村民素养，实施文化扶贫的基础，也是提高农村持续发展能力的根本出路。因此，驻村工作队十分重视和关心H村基础教育的发展，积极争取派出单位的支持，Z大学为H村设立了专门教育基金，用于资助该村贫困学生，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失学。学校团委还组织研究生支教团在该镇中心小学采取“一对一”“多对一”等方式与贫困留守儿童结对子，为他们提供学习和生活等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四）有效利用派出单位资源，积极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和科技文化活动。

在乡村开展种类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对于村民健康和积极向上的文化品位养成，消除和取代赌博等具有消极影响和恶俗趣味的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传统戏曲表演、体育竞赛、读书活动等有益的文化活动要在乡村持续地开展，无论从人员组织，还是经费支持，靠村集体自身是无法承担的。在精准扶贫背景下，驻村工作队代表派出单位完成政府和党组织的指派的扶贫任务，派出单位有义务在各方面对工作队的扶贫工作进行支持，理当是主导和开展这类文化活动的最佳主体。

Z大学驻村工作队特别注重文化生活在文化扶贫工作中重要作用的发挥，从派出单位寻求资源等各方面的支持，在H村开展了一系列的公共文化活 动，并将此形成一项制度予以落实。例如，每年校医院定期在H村开展义诊和“送医送药”活动。义诊时医生们向就诊群众传播疾病预防控制相关知识，并发放了健康知识宣传折页，指导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健康饮食，倡导科学生活方式；定期组织相关法学专家和律师赴该村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村民就变更抚养权、债务债权关系、拆迁补偿、诉讼时效、租赁纠纷等法律问题进行了咨询，专家们进行了耐心解答，增强了当地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此外，应驻村工作队的要求，选派多名骨干教师前往H村，通过开办“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道德”为主题的系列讲座，以通俗易懂、风趣幽默的方式向村民宣扬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激励他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弘扬时代新风。

（五）开发特色乡村文化产品，大力发展乡村文化产业。

充分挖掘贫困乡村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资源，开发文化产品，发展乡村文化产业，一方面能使当地村民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使其摆脱贫困；从另一方面来讲，从当地的文化资源中获得利益，增强了村民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因为参加到文化资源开发所延伸出来的现代商业和工业活动，村民得到了个人技能、思维和判断等方面的培育和发展，从而倾向于认同积极进取、不断奋进的现代文明。

在驻村工作队的争取下，Z大学在校内提供专门场所开办了H村特色文化产品和农产品的扶贫“专卖超市”。为H村开发黄龙山特有的富硒泉水资源，注册“H”牌矿泉水文化品牌，并为该矿泉水争取销路和拓展市场；依托H村特有的民俗，在驻村工作队的支持下，该村还制作出了“农法豆皮”“农法紫苏酱”等富有特色乡土文化气息的农副产品，这些产品浓缩了H村特有的风土、泉水和传统的制作工艺，体现着村民勤劳和智慧的内在精神，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因为对这些文化产品的兴趣，有很多消费者陆续到黄龙山H村文化旅游，探索“H”牌泉水的源头，观看和参与“土法豆皮”的制作过程。通过文化产品开发和文化旅游的发展，给H村村民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村民实实在在感受到勤劳致富所带来的生活质量提升和获得感、幸福感，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如今的H村，村民中打麻将、闲逛、游手好闲的越来越少，都积极努力地投入生产，一有时间就生产更多的土特产品委托扶贫超市销售，此举带动了整个H村村民的劳动热情和精神风貌的根本性改变。

此外，驻村工作队还通过协助村民开办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并联合技术人员对村民进行种植、养殖等农业技术培训，提高了农民的专业技术水平。在从事文化产品生产、销售、商业拓展的过程中，村民逐渐熟悉和培养市场规则意识、契约精神和法治精神等现代文化的精髓，培养了一批乡村的致富能手和乡村治理人才，他们成为乡村经济持续发展的宝贵人力资源。

（六）提高村民自治和自我管理能力，传播社会主义民主文化。

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公民的自我管理和自治，即社会中的个体都是具有自由意志的、能够自己承担责任的主体，在共同体的生活中，他们直接或间接的选举代表，自己治理自己。这一点体现村庄生活中就是村民自治。驻村工作队能协助村民有效开展自治，将村民的自我管理引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从而将自由、独立、负责这种现代文化的精神注入贫困村庄。

首先，驻村工作队可以提升村“两委”工作班子的理论和政策水平。村“两委”干部虽然熟悉村庄的情况，善于处理群众关系，基层工作经验丰富，但是知识文化水平不高，对于最新的党的理论政策不熟悉或者理解执行不到位。驻村工作队通过和村“两委”干部的培训、沟通，将党的最新政策、方针准确的传达，并且通过开展党的组织生活等方式，提高村干部的党性原则、纪律和法制意识，保障村庄治理的正确方向。H村驻村工作队定期开展村支部的“主题党日+”活动，将“两学一做”等党的理论和政策学习常态化、制度化，使得村支部的党建工作和基层的党组织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其次，驻村工作队推进了村民选举的民主化、法制化。民主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基石，在以往的实践中，村民由于法律知识有限，对于自己的权利和责任意识淡薄，参与公共选举和议事的积极性不高，村里的选举活动经常流于形式。驻村工作队通过向村民教育和宣传民主选举的有关知识，提升其权利意识、民主意识和参与热情，促使其积极主动行使合法权利。不仅如此，

驻村工作队还作为一种监督性的力量确保村庄的选举符合法定的程序，推动着选民选举的公开、公正与公平。^{[6] (678)} H村驻村工作队通过各种形式向村民宣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着重强调了重大事项村民会议的民主决策制度。在工作队的监督和促进下，H村村民形成了自觉的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民主议事，自我管理，干群关系和谐，村里的社会风气健康向上。

再次，村民自治的良好展开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集体经济的发展。驻村工作队可以通过整合各种力量，为村民致富和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一方面，村民作为理性主体从事经济和商业活动的过程中，自我管理和议事能力得到了发展，提高了各方面的综合素质和自治能力。另一方面，村集体经济发展取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后，才有资金和条件开展各种公共文化服务活动，如对困难的学龄儿童提供经济资助、开办老年文化活动中心、办好村里的文化馆和图书室，农业技术培训等等活动。H村驻村工作队通过引入油茶种植、贡菊种植、蜜蜂养殖、土猪养殖等农业项目，提高了H村村集体和村民的收入，为H村的文化扶贫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条件。

可见，Z大学在H村驻村工作队开展工作以来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成效，H村近三年来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文化活动开展、文化帮扶活动开展、特色文化产品开发、村民自治及自我管理等方面均呈现出了进步的可喜局面。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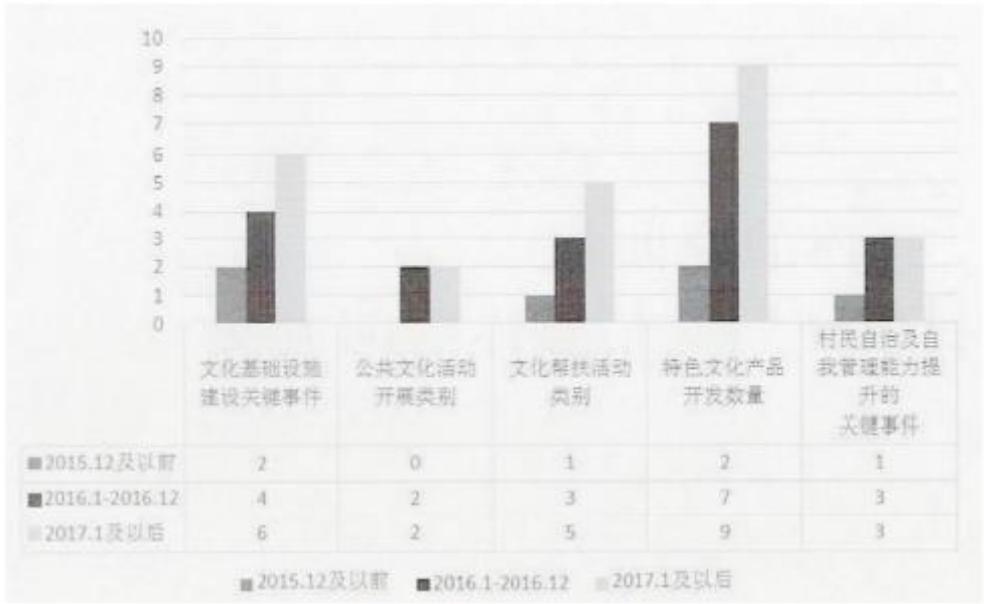


图1 Z大学在H村文化扶贫成效示意图

数据来源：根据《湖北省驻农村工作队（扶贫工作队）工作简报》（2015—2018）整理所得。

综上，驻村工作队可充分发挥其派出单位在发展理念、专业知识、社会资源等多方的特定优势，突破了传统扶贫中多侧重于外在经济援助或招商引资的局限，专注于文化精准扶贫和功能发挥，从贫困最内核的观念根源、能力根源入手，充分发挥嵌入式、特色资源禀赋精准识别式的扶贫机制优势，通过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活动，促进文化产品开发与文化产业，提高村民自治与自我管理能等全方位发力，使得文化扶贫功能在精准扶贫实践中践行落地，为乡村精准扶贫提供了有效路径和切入点，其实践探索为乡村经济发展致富和村容村貌建设等内源驱动机制构建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参考文献:

[1]卢冲, 庄天慧. 精准匹配视角下驻村干部胜任力与贫困村脱贫成效研究[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5) .

[2]张世定. 文化扶贫: 贫困文化视阈下扶贫开发的新审思[J]. 中华文化论坛, 2016, (1) .

[3]孔德斌. 嵌入式扶贫的悖论及反思[J]. 理论与改革, 2018, (2) .

[4]杨刚, 杨静. 精准扶贫视域下驻村干部研究述评[J]. 贵阳市委党校学报, 2018, (2) .

[5]陈然, 张琪琪, 等. 嵌入与帮扶: 驻村工作队在农村精准扶贫工作中的效度与限度研究[J]. 黑河学刊, 2018, (4) .

[6]陈国申, 孙丰香, 等. 嵌入型村干部与村民自治的冲突及调谐——对下乡干部的考察[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7, (5)